



小说文化学

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ovel Culture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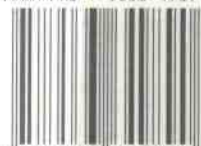
钱雯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ovel Culturology*

ISBN 978-7-5336-4989-0



9 787533 649890 >

定价: 29.00 元

I207.42/40

2008

博士文库

小说文化学

理论与实践

钱雯◎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文化学理论与实践 / 钱芸著.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5336-4969-0

I. 小… II. 钱…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7228 号

责任编辑: 王竞芬

装帧设计: 许海斌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38 号

邮 编: 230001

网 址: <http://www.ahji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创意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开 本: 680 mm×980 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50 500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000

定 价: 26.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3693078

目 录 | C O N T E N T

导 论 问题的呈现	001
-----------------	-----

上 篇

小说:在文化学视野上

第一章 小说文化观念	023
第二章 小说形象与文化	037
第三章 小说与文化精神	053

中 篇

20 世纪中国文化主题与小说

第四章 小说与文化转向	071
第五章 小说与启蒙	091
第六章 乡土中国与现代性	111

下 篇

人学重建与小说

——以五四新小说为中心

第七章 从科学到人文	133
第八章 人文：在中西古今之间	138
第九章 人学与白话文运动	175
第十章 民族风景与描画	205

附录一

文化诗学：理论、方法及局限	234
---------------------	-----

附录二

在观念与叙事之间——余英时的阐释及其困惑	248
----------------------------	-----

参考文献	263
------------	-----

后 记	270
-----------	-----

导 论

问题的呈现

我们总是封固自己,不去批存在新经验为存在着的——这种情况
还要延挨多久呢?^①

葛兆赫书

—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贾珍清点黑山村的收成。这年年成不好,早涝过后接着又是冰雹,贾珍比预定的少收两千多两银子,荣国府那边更是“人乏了”,多出几倍的庄地,不过多出两三千两银子,用乌进孝的话说,“也是有饥荒打呢”。收成不好,可是年前节后,贾府规矩仍旧,场面不减。换桃符,挂米灯,进宫朝贺,宗祠祭祖,元宵夜宴……宁、荣二府“群燕戏之盛”,谈笑喧哗,热闹辉煌。越过这年除夕,贾家

① [德]陶然格赫,荷尔德林诗的内涵,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1页



至14岁,宝黛相处进入第8个年头。

直到19岁应举业,贾宝玉的“正经事”无疑是读书。问题不在读书的地点是家塾还是怡红院,管教他读书的是贾政还是贾代儒,问题也不在贾宝玉愿不愿当被“正经事”,用心不用心读书,问题的实质是,对生在贾府,贾宝玉没有选择;同样,对读书本身,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收成不好,仿佛显出贾府覆败的迹象,然而,支持贾宝玉读书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仍然是他“最要紧的”任务。^[1]在此意义上,不论贾宝玉主观上对读书持何种态度,客观上,他是一个书生。

这是宝黛情爱发生的基本背景。男女情爱有其不变的内容,然而,情爱如何参与到生活之中,构成小说的主题,这却不是由情爱本身所决定的。生活的程序、文化的格局,影响和决定着人们对情爱的态度和方法,影响着情爱呈现的形式。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因为生在贾府,身负“补天”之责,他必须读书,因为生活秩序维系在读书之上,男女情爱才从反而呈现出它异乎寻常的意义。“开辟鸿蒙,谁为情种?”贾宝玉无疑是一颗情种。通灵宝玉被置于青埂峰下,表明贾宝玉不仅要写情爱,而且要在天上地下为人间情爱寻找根源和基础。曹雪芹书写男女情爱的努力与热情,是被那些从反方向压抑情爱的制度与格局所决定的,宝黛情爱内在的曲折与险陷,亦始终映照着它与外部制度文化不死不休的纠缠与格斗,因此,《红楼梦》是一部情爱史,也是一部制度史,一部文化史。

现代小说作者或者小说主人公,大都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背景,情爱书写也出现了与《红楼梦》不同的情况。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最大的区别,表现在知识结构与性质的根本性差异上:应用性的自然知识取代四书五经,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知识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

[1] 曹雪芹:《红楼梦》,济南:齐鲁书社,2002,60页。

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政治规范,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主要知识形式;西方式的以学科化为中心的 school 体制取代过去的私塾、书院,成为散播知识、生产知识的主要制度平台……所有这些,又以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为依托。这样的知识与教育格局,改变了读书人的身份,也改变了读书的出路,其对男女情爱的影响,至少有一个大的方面:

第一是门第关系的弱化。传统婚姻追求门当户对,这也是一种财富聚积的形式;读书人以此获得经济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男女情爱处于次要的地位,它并非婚姻的必要条件。现代教育把读书与职业选择联系在一起,比如,如果不是后来弃医从文,鲁迅应该是一位医生,郁达夫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他的职业取向应该在经济学领域。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职业分工,使读书人有了新的出路,经济独立成为可能,在这个基础上,门第依然是财富聚积的条件,但读书人对门第的依附得以被破除。门第关系的弱化,在相对意义上,使婚姻有可能传达自由意志,从而使男女情爱对于婚姻的支配性突出出来,或者说,使男女情爱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问题。沈从文统计 1921 年 4、5、6 月间的小说创作,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 95%,这正是男女情爱对于婚姻的支配性的写照。

第二,读书人与家庭关系的弱化。贾宝玉生于贾府,终其生亦走不出贾府,他是压脱手,这所做与家的最后一点联系,然而,“他所要砍掉的,正是他赖以托身的”,^[1]离开贾府即离开整个世界,出“家”即出“世”。个人与家一体相连,贯穿男女情爱,把它转变为家庭关系的一部分,所以传统文学中书写的情爱,直到《红楼梦》,其与家庭关系相比,是第二位的,它的困难与挣扎,既因家而起,也以家的存在为条件。现代教育对家庭关系造成巨大冲击,它面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起与家文化不同的另一种知识谱系,在知识性质上与以书五经所传授的

① 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北京大学学报》,1953(4),22页。



规范性知识相分离,此外,它所提供的知识传播空间——学校,所给予的职业前景,都不再以家的先验性存在为条件。家的观念淡出现代教育格局,启示着男女情爱对家的超越的可能及情爱观独立的可能,这在现代小说中有极为显著的反叹。郁达夫的《沉沦》,乃直接以情爱为对象,家国忧患不再是情爱的先验基础和条件,而是转变为情爱书写的一个构成性因素,其中灵与肉的冲突,在情爱的内部展开,而非如传统小说那样,在情爱与家的关系中进行,这正是现代小说中新的“风景”。周作人评《沉沦》:“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压迫的对抗……我们赞赏这部小说的艺术能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去给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实意。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地受觉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①此极为真切地指示出郁达夫新小说的“新”质。之后的《他》三部曲,把急剧变动的时代纳入情爱书写中,逐步揭发情爱心理的秘密,这只有在情爱观独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现代小说中“离家出走”的母题,在小说文体学意义上,也是关于现代小说文体发生的母题,其中所开展出来的,是小说书写一个崭新的地平线。

第三,求婚情节的出现。在婚姻不能自主的情况下,没有求婚事件发生,所谓爱与不爱,不具有情节意义。支持李甲与杜十娘故事的,是李甲之父,那个不在场的“在场”,同样,支持贾宝玉与林黛玉故事的,是贾老太君、贾政、薛宝钗一家人等,没有这“第三者”,不但形成对立冲突,这个故事就没有骨架了。现代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求婚引入情爱叙事,借用伊恩·P·瓦特论理查逊的话,求婚这条行动

① 周作人:《沉沦》,《郁达夫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13~215页。

线构成现代小说的情节基础。^①在《彷徨》中,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不能阻止胡冲和子石结合,也不能阻止他们分开,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相互之间的爱与不爱,所以在结合时,他们可以无视一切冷眼,而当胡冲说出“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等,这段婚姻立刻就结束了。爱或者不爱是彼此的选择,也是自己对自己的选择,现代小说以情爱为本位,开始面对这种种选择,情节开展的新的可能性正是从这里发展出来。这在向外的方面,把各种社会因素,包括门第和家庭,加入进来,使小说容纳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在向内的方面,则把各种观念的因素加入进来,使小说具有了灵魂的深度,成为真正的心理性小说。柳谷行人说道,所谓“内在的人”,是在现代文学中出现的“新风景”,^②进一步来说,这个“新风景”的出现,与情爱叙事和求婚情节有不可解的关系。

二

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说道:“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族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三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③小说第一回以隐喻的方式写家国之痛,一艘被雷的大船,眼看就要倾覆,船上水手惊慌失措,乱了手脚,老残和两个朋友驾了铁船追上去,欲送住他们,罗

① [美] 舒思·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150页。

② 彷徨,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6~127页。

③ 日本柳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29页。

④ 刘鹗:《老残游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页。

盘和纪限仪等物，帮他们掌握方向，安全驶出风浪，却被水手们指为“洋鬼子差进来的奸奸”，赶离大船，道义也被融得粉碎。

“棋局已残，吾人将老”，哀麟为家国一哭，漏船之喻，高深悲矣！书写家国之痛，是晚清小说一个普遍的主题，阿英把它列为促成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之一，^① 值得讨论的是家国情感的表现形式。刘勰显然还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格局中谋划救国之策，若敖等人救船送上外国罗盘和纪限仪，结果被口为“奸奸”，而龙子倍受煎熬，拍世运，论“北季南萃”，却又被鼓玄同斥为“老新党”之信口雌黄等，这正是晚清小说的两面性。家国情感也一直贯彻现代小说史，并构成现代小说发生的基本动力，不过，在家国情感的表现形式上，现代小说与晚清小说却有着根本的区别，两者之间的分际，显著地表现在这个地方。

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道：“我国说部，得言情谈故刺时志泽者，如弹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以荒陋，此实一憾。故句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② 这是从促进维新的意义上提倡科幻小说，其对小说文体功能的认识与梁启超之提倡政治小说并无二致，它们都欲借小说这副“优秀之衣冠”，灌输新的理念，教化人心，这还是“西学为用”的思想。到《科学史教篇》，鲁迅从学理意义上论科学：“（愿治科学之策士）盖仅以知真理为惟一之仪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四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试察所仪，岂在实利哉？”^③ “所仪”不在“实利”，则另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30，1页。

② 鼓玄同：《致蔡鹤青信》（1917年2月25日），《严家炎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4页。

③ 《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1页。

④ 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33页。

有根基,这就是“用”归于“体”了。《科学史教篇》从历史与逻辑上反复申述“本末”、“母子”关系,以破除虚渺的实利观,建立西学“体用”论。西学自有其“体”,这是对西学自主性、独立性的认识,它成为西学在中国专门化、体制化的先声。这个体制化过程伴随着废科举的废立,留洋科学知识分子的回归,特别典型地表现为现代教育体制的建设、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科学研究团体的逐渐形成。在鲁迅写作《科学史教篇》的时候,这些无疑还处在幻想阶段,但正如文中所说,邦国安危,既系于科学,则其“不能不要求于社会,且亦当为社会要求者矣”。法国大革命初期,国家内忧外患,危在旦夕,然法国不亡,一赖根基的科学力量爆发,二赖爱国激情,“大业之成,此其枢纽”,其他如“政事之惑”、外物之助,都是末叶了。对西学体制化的认识和实践,造成“中体西用”说的破产,促使家国情感转移方向。1911年,丁文江回国,次年底,任工商部矿务司地质科科长,创立中国第一个地质学专门教育、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1911年,高鲁回国,担任中央气象台台长,他汇集当时天文学才俊,破天文之禁,创立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组织和机构;1913年,赵元任、任鸿隽、胡明复等人在美国绮色佳城成立中国科学社,发行《科学》月刊……这些经历严格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不会可以拥有外国罗盘和纪限仪为满足了。

西学“体用”论的另一个结果,是现代小说的出現。鲁迅弃医从文,郁达夫从经济学转向文学,郭沫若的医科学历,冰心从医科转文科,茅盾读北京大学预科……这都为人所熟知。从广泛意义上说,现代小说作者,几乎都有接受现代学科教育的经历,或者说,他们作为现代小说家的身份,几乎都是从某种特定学科从业者身份转变过来的。这足以反映现代小说与现代学科体制之间的发生学联系。米歇尔·福柯说道,现代文学是在一个与它相关联的更大的知识背景上生成的,就像康德美学只有在知、情、意的知识结构中才能被发现一样,现



代文学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并且也是最意想不到的弥补”。^①按照福柯的论述,现代语言学的“决定性要点”在于语言的内在结构即比较语法,它与李嘉图以生产理论为优先性的经济学、居维埃把注意力引向器官功能本身的比较解剖学遵照相同的知识构建模式。在这样的知识图景上,年代学次序被打散,古典时期语言与表象之间稳固联系的统一性网罗被粉碎,各门学科分别在功能演化的意义上建立自己的学科史,并相互区别开来。现代文学是在历史语法的可能性语境中所作出的一种“浪漫主义的反抗”,在语言被知识所贯穿的时刻,它以反省语言的诞生之谜的形式,从观念的、墨守成规的话语中突围而出,确立写作的自在性。所以,现代文学是在19世纪初出现的,它的美学表达,即康德的审美自律和天才观。福柯的论述对于理解我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具有启发性。20世纪初的中国,在最早接受西学的知识界,发生了科学新次体制化的事件,与此同时,一场文学运动也在酝酿之中。这场运动与历史上文学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以科学的体制化为背景和起点,在一种新的知识语境中重新提出文学问题,即从科学转向人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现代文学在发生期,实际上同时肩负两项使命,把福柯所言的构建历史语法的知识论任务与文学突围的任务同时承继起来,前者表现为白话文运动,后者表现为新文学的创作。那些从科学中转出的知识分子,一面在建立汉语言的新秩序,一面在返回汉语言的诞生地,他们尝试以与刘鹗完全不同的美学形式,书写自己的家国之痛。从鲁迅弃医从文事件到文学革命,再到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可以清楚地辨认出从科学到人文的历史线索。

小说不同于语言学。鲁迅在弃医从文以后没有立即走上创作之路,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思想,本人却并非创作家,茅盾提倡自然主

①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费伟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391页。

义,他的《蚀》三部曲却并不与其理论相一致……现代小说写作的自在性在知识论背景上被照亮,然而,自在性写作本身却另有起源,它是在别的地方被重建的,它是知识的孪生形式,又是对知识规范的反动,所以康德说:“没有美的科学,只有美的艺术。”那么,现代小说的起源地在哪里?我们可以从鲁迅的小说中寻找问题的线索。

《孤独者》写到魏连受的死:

起入红毡褥起来,我走近会桌后坐,一看朱阿四的遗文。

他在不爱穿的衣冠中,安卧地躺着,合了眼,便着嘴,嘴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怜的死亡。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去,但是不能,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但它像是长啸,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而又饱含愤怒和悲哀。^①

在鲁迅的小说中,相似的场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吃人的人世间之下,在人们的“放声大笑”,亦尝不是“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在连成一气的如狼一般的眼睛里,阿Q的灵魂被啃咬和吞噬,所以有折断在喉咙里的“救命”的惨叫;夏瑜坟前那铁铸似的乌鸦,在死一般的静里“哑——”的一声大叫,比坟头的花圈更为惊心动魄……正如《孤独者》题目所点出的,鲁迅的小说深即着一种无法被语言所穿透的孤独感。这是双重的孤独:在知识论意义上,这是在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之间不妥协的孤独;在“纯文学”即“美的艺术”的意义上,这是反抗现存知识秩序的孤独,包括魏连受自己,也被这种孤独所吞没。借用现代经济学术语,这是一种“生产性”孤独,它在现代知识语境中被发

① 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13页。

现,又以其不可遏止的力量,摧毁语言的一切旧法与新法,把每一次写作,都转变为一次文字再生的仪式。“祭式的特别”乃为了“表现的深切”,在这个孤独体验中,进化论、自后文、“真的人”、“救救孩子”……既被肯定又被否定,既被选择又被抛弃。也许可以参照海德格尔的论述,把它称为一种根源性孤独,一种“本质性”孤独。这种孤独体验,正是鲁迅的家国之痛,它构成现代小说的入口。

三

在每一位现代小说家的心中,都有一份关于乡土的记忆:鲁迅的“故乡”、“社戏”,郁达夫的“富春江”,沈从文的“边城”巫歌,萧红的“呼兰河”……所有这些,既是他们在现实中设法摆脱的梦魇,又成为他们时时回望、不离不弃的精神向往。这是一个内难的问题,现代小说家在既被拒斥又被吸引的精神困难中,把乡土书写高度形式化,他们以这种方式走进民族和历史。

鲁迅在《故乡》中说道:“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①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说道:“离乡已经十八年,一大辰河流域,什么都不不同了。”^②“大抵”,阿Q、“鲁四老爷”、闰土、翠翠祖父、有二伯……他们曾经是那么熟悉,十年二十年以后,他们又变得那么陌生。《故乡》清晰地表达出这种情感变迁的脉络,对眼前的乡土表现的是隔膜,对记忆中的“小英雄”却是十分的留恋和向往。《社戏》和《阿Q正

①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01页。

② 沈从文:《长河》题记,《整理群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11页。

传统是同一个乡土的印刷面相,就像阿·托尔斯泰有两面一样。事实上,不论是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萧红,还是其他任何一位现代小说家,都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了,他们对周围的世界所表现的陌生和冷漠,将他们“隔成纸身”,将他们与乡土彻底分开,也唯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踏上返乡之旅,那些残留的记忆碎片渐渐被感知,并被编织成关于乡土的想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想象”一词有三个意思,第一,像鲁镇、边城、平兰河城……作为“共同体”的名称,所指示的分别是共和“象征性”存在,“事实上,所有成员之间有着面对正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人们通过这种想象与那些熟悉的人相关联,更与那些从未谋面的人连成一体。第二,“想象”为非“捏造”和“虚设”。历史地形成的宗教、政治共同体以及通过神谕联结起来的时间的“同一性”构成“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根源,在宗教的体制解体、政治王朝崩溃,神谕的时间瓦解的过程中,那些隐微而不易辨识的感觉残留物被同地存续下来,作为社会心理事实,聚合在关于“共同体”的“想象”中,“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设/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第三,所谓民族,正是“想象”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被“创造”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按照安德森的论述,民族不是自来就有的,“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才是让‘思考’民族这个行为变得可能的最重要因素”^①。促成民族想象形成的这个“变化”,包含传统文化对人的心灵控制力的丧失,以及启蒙运动以后人类心智深刻的、根本性转向,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得以用新的方式思考自身,并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冠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3页。